

复 印 报 刊 资 料

怀念刘少奇同志资料专辑

中国 人 民 大 学 书 报 资 料 社

北 京

K821
Z46
1:2

003938

目 录

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

- (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 刘少奇 (5)
答宋亮同志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三日) 刘少奇 (13)
刘少奇同志的亲笔信 衍 行 (16)
积年珠玑重放光彩 申 言 (17)
刘少奇同志题词重放光辉 蔡水泉 (19)
少奇同志的题词 陈 烈 (20)

刘少奇同志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

- 贡献 人民教育编辑部 (23)
党校建设的鼓舞者和指导者 (怀念少奇同志) 杨献珍 (29)
刘少奇同志是执行党的工运路线的楷模 宗 怀 (89)
刘少奇同志在工会中担任过哪些职务? 苏东海 (102)
少奇同志在安源 郭 晨、裘之倬 (35)
刘少奇同志在安源大罢工中的历史功绩 裘之倬、刘传政 (91)
刘少奇的小布衫 文 沧 (42)
工人阶级一位勇敢的战士 (刘少奇同志
在一九二五年) 新华社记者 (99)

-
- “工人阶级的最勇敢的一位战士”(第一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刘少奇同志在广州领导工人运
动的业绩) 杨绍练、邓炳权 (39)
少奇同志和早期广东工会的联合 罗雨林、韩子西 (41)
全心全意为工运事业奋斗 (刘少奇同志
一九二六年在广州) 周德光、曾庆榴 (43)
在反帝斗争中建立功勋 (刘少奇同志在
一九二七年) 新华社记者 (103)
刘少奇同志领导工人收回英租界 廖鑫初 (45)
刘少奇同志在津活动资料 窦爱芝 (47)
满洲省委的卓越领导者 (刘少奇同志在
一九二九年) 新华社记者 (107)
披荆斩棘开拓胜利之路的卓越领导者 (回忆
少奇同志在满洲省委的斗争片断) 王鹤寿、赵毅敏 (110)
少奇同志在满洲省委 杨一辰 (113)
刘少奇同志在满洲省委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 (49)
KV——刘少奇同志的笔名 秋耘 (56)
少奇同志在瑞金的时候 杨至成 (106)
刘少奇同志一九三六年在天津 (这段历史曾在
十年动乱中被诽谤、被污蔑过) 李夫等 (115)
敬爱的少奇同志战斗在皖东 李世农、黄岩 (119)
难忘的教诲深切的怀念 (回忆刘少奇同志
在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几个片断) 胡炳云 (122)
少奇同志抗战时期在安徽的革命活动 张学恕 (57)
战士的怀念 (访在刘少奇同志身边工作过的
马书年同志) 罗传发等 (125)
-

从延安奔赴中原（在少奇同志身边的难忘岁月）	苏斌	(129)
逐鹿中原（三建中原局的回忆）	刘子久	(59)
来安县隆重纪念“半塔保卫战”四十周年（缅怀		
刘少奇同志的伟大功绩）	来安县委通讯组	(61)
来安人民的怀念	朱显亮、刘汉章	(133)
良师·表率·引路	周长胜	(118)
为了加强党的建设（少奇同志在华中党校）	温仰春	(135)
斯人虽逝去，高风劲节存（回忆我的入党		
介绍人少奇同志）	沈其震	(137)
少奇同志关怀我们警卫战士	许志望口述、柳忠勤整理	(160)
少奇同志和铁道游击队	杜季伟等	(63)
驳“‘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刘少奇的投降路线”	李兴仁	(139)
重温刘少奇同志对河北工作的教诲	河北日报编辑部	(141)
回忆少奇同志对人民大学的关怀	成仿吾口述、彭明整理	(65)
老战士深情怀念少奇同志	周学之、郑国联	(68)
一堂党的新闻课（回忆刘少奇同志对华北记者		
团的谈话）		(69)
贺少奇五十寿辰	朱德	(60)
应该正确理解刘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	俞明仁	(75)
少奇同志使我下决心跟党走	王光英	(79)
深切怀念少奇同志	荣高棠、黄中	(81)
少奇同志的体育活动		(84)
刘少奇同志和泥巴腿	王升萍	(85)
在少奇同志身边工作的日日夜夜（访少奇同志		
原机要秘书王干同志）	简瑞年	(128)
在少奇同志身边的两天里	宋瑞云等	(144)

-
- 刘少奇同志在太原 赵正晶等 (145)
哪样工作都光荣 时传祥遗作 (149)
湖南人民深切怀念少奇同志 中共湖南省委员会 (151)
回忆在少奇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李 强等 (157)
学习刘少奇同志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作风 张平化 (161)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王光美谈刘少奇同志) 萧庆璋等 (165)
王光美同志给《工人日报社》和《中国青年杂
志社》的信 (167)
王光美同志给《萍矿工人报》写信，向安源
工人干部致以敬意 文湘域、胡观澜 (21)
在修缮中南海时的刘少奇 王光美摄、李瑞明诗 (168)

作一个好的党员， 建设一个好的党

(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

刘少奇

本年七月一日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十九周年纪念日，《抗敌报》、《前锋报》及《迈进报》(注)均要我写篇文章。我想，我们的党已成立十九年了，在这十九年中，它经过了“二七”运动，经过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大革命，又经过了十年苏维埃运动与土地革命及十年的秘密工作，今天再经历着第二次国共合作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就是说，在这十九年中所有中国历史上一切伟大的事变与群众的革命运动，我们的党都是站在群众斗争的最前线。每一次都表现着我们的党和无数的党员是具备着无产阶级政党之革命的英雄气概，牺牲精神和坚忍卓绝的模范，表现着我们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与历史事变中的伟大作用，表现着我们党是有能力继承并忠实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事业的布尔什维克的党，同时也表现着我们的党是最坚决最彻底最能为中国民族独立解放事业而奋斗，最能与压迫中国民族的帝国主义战斗的党。

我们最大多数的党员，他们那种为公共事业而牺牲奋斗的精神，那种为民族独立与社会解放而艰苦工作的精神，那种既不想升官发财，又不为名为利，而一心为了劳苦大众与人类解放事业而不疲倦地埋头苦干的精神，表现了他们有人类中最崇高的道德，他们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因此也就吸引了并且吸引着无数千百万的诚实的人们对于我们的党，对于我们那些最好的党员的敬仰。不论我们的敌人是如何造谣诬蔑我们的党，如何说我们是“洪水猛兽”，如何用一切残暴手段对待我们及对待接近我们的人，然而无数千百万的人们还是把他们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身上。他们在无形中对我们的党下了这样一道委任令：你们共产党人，是真正能够牺牲自己为中国民族与劳苦大众的解放而战斗的人们，中国之所以能得救，中国之所以必能走上富强、独立与自由的光明前途，就赖有你们这样一批人的努力，因此，给予你们以救中国，创造独立、自由与幸福的新中国之任务。这就是说，我们的党在十

九年来赖有无数先烈的英勇牺牲与无数党员最好的努力，已经使我们的党大大地发展了，它已成为全中国的群众的党，它已与中国广大的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它已在广大的群众中有了极高的威信，而且它在十九年来经历了比世界任何一国的共产党都更多的重大事变，有更丰富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不论公开的与秘密的，武装的与非武装的，国内战争的与国际战争的，经济的与政治的，思想的与群众的，党外的与党内的……各种复杂形式的革命斗争，我们的党都经验过了，都有丰富的经验。我们有许多党员十余年来，一直就没有放下过武器。这是十九年来为世界任何一国革命政党所不及的。所以我们中国的共产党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九年，即已成为共产国际中最好的支部之一。这是我们伟大的党在伟大的十九年中在伟大的中国所已获得的成绩。这些成绩，不独是对中国一个国家有它极重大的意义，对于世界，特别对于世界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亦有其重大的国际意义。

然而，这些成绩，并不是那样容易得来的，而是经过了整整十九年的苦战与艰苦工作，牺牲了数十万最好共产党员与非党革命者的头颅和热血，克服了党内各种错误和机会主义的思想，淘汰了党内各种腐烂的渣滓，并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武装我们许多党员的头脑，才能锻炼出如我们今天这样的党，才能获得这样伟大的成绩。这是为无数革命者的热血所浇灌而成长起来的中华民族的鲜艳之花。不久，它将结成为中华民族赖以得救赖以自由的无价之果。从我们党过去十九年的历史证明：不论我们党的一切敌人如何痛恨、咒骂、诬蔑、枪杀、陷害、蹂躏与围剿我们，——如何采用一切残暴的手段来对待我们，他们终究是不独不能消灭我们的党，甚至连阻止我们党的发展亦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党，就是在和这些敌人的这些残暴手段之斗争中，生长、壮大与坚强起来的。因为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党，是代表着历史上最进步的无产阶级的党，因此，我们是永远不会被消灭的，我们是不可被战胜的。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战胜我们的党，相反，我们将战胜世界上一切的反动势力，将把世界改造成为最进步最美满最合于我们理想的共产主义世界。

在纪念我们伟大的党之十九周年的今天，我们无数的新老党员，应该是如何来估量我们党所以获得的成绩及我们党在中国的与世界的革命运动中所已取得的重要地位！应该是如何来看清与笃信我们党的光明前途！应该是如何来保护我们的党，为了党的每一个利益（就是为了中华民族与人类解放的利益）而牺牲奋斗，尽我们最善的努力！党的建设，达到今天我们中国党这样的程度，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今天我们的新老党员，接受了我们先烈遗留下来的这一份无价的遗产，应该是如何地宝贵它！如何在我们党已有的成绩和阵地之基础上推

动我们的党再向前进，建设它，加强它，发展它，以至于达到最高级最完善的程度！我们要建设一个最好的党！要达到这个目的，固然需要我们各方面的努力，需要中央与各级领导机关正确的领导，但是最基本的还需要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党员。因此，我们党员在此党的十九周年之伟大节日，应该诚心地来检查一下自己，应该问问自己：你为了党的利益、党的发展与胜利，曾经尽了你何种努力？你预备怎样在今后来尽你的努力？你是否曾经有过违反党的利益之思想，言论与行动？怎样才能在今后不会再有违反党的利益之思想，言论与行动？我想，党员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使自己进步的出发点。我们每个同志都应该在党内作一个好党员，而不应该作一个不好的党员，作一个有毛病、有错误、思想意识不正确的党员，尤其不应该作一个半途的党员。我们每个同志怎样才能作一个好的党员？这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来作为我们的模范，这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篇文章上已说了许多，这里不再详说。但我最近在党内某些同志中发现了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行动，有了这些思想和行动，就决不能成为好的党员，并且还要影响其他的党员及阻碍我们党的进步。今特利用党的十九周年纪念之便，略论之如下：

第一、要尽心负责地为党工作，爱护党的每一个事物，如自己的事物一样。

我们共产党人，是今天世界上一种特殊的人物。我们是为了公共事业，即共产主义与人类谋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一种人物，为了大众的利益与解放，为了我们大家的长远的幸福，我们有时不能不暂时地有所牺牲，不能不牺牲自己。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决心牺牲自己（当着为了整个党的利益而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时候），为了大众解放的公共事业而奋斗的一种人物。这是我们党员大家所知道的，也是我们大多数党员所能身体力行的。然而我们的某些党员，在一些最平常的事物上，常常暴露出他们并不能这样作。

这些同志常常用两种不同的态度来对待属于他自己个人的事物和属于党的公共事物。就是说，当某种事物如果是他个人的，他把这一事物看作是自己的，他对于这种事物就爱惜，节省，尽心，负责。但是当某种事物并不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党的公共的事物，他把这一事物看作是党的、公家的，不是他自己的，如是他对于这种事物就不爱惜，不节省，不尽心，不负责，或者甚至把党的事物暗中窃取作为私有。就是说，他对自己的私人事物的态度，是与对公共事物的态度不同的。他对党的公共的事物，认为这不是他自己的东西，所以他不爱惜，浪费，不尽心，不负责地去照顾。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他自己的，因为这是公共的。他不把公共事物当作他自己的事物一样尽心负责地去照顾与努力。这类现象，在我们某些党员的日常生活中工作中是经常可以看到的，并且常常成为各种浪费

现象及各种不负责任现象的产生之根源。

这种观念，很明显，是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是一种旧社会的私有观念的残余。有这种观念的人，不了解党员自己的事物与党的公共的事物之间的矛盾一致的关系。他认为党的公共的事物，不是他自己的事物，所以对党的公共的事物之态度，不同于对自己的事物之态度。很明白，这对于一个党员来说，是一种根本上错误的观念。我们的党员必须改正。

我们应该说：只有属于党的属于劳动者全体所有的公共的事物，才是我们自己最重要的事物。此外，对于我们党员来说，对于劳动者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

当着工人在资本家的工厂中作工，工人自己觉得这是为他自己，为他自己的家庭的生活而工作的时候，列宁曾经说：这些工人都不是为他们自己工作，而是为资本家的利润而工作。只有当着工厂已因革命的胜利而属于工人阶级国家所有，成为社会的劳动阶级全体所有的公共财产的时候，列宁才说，只有在这时候，工人才是有史以来头一次的为他们自己工作，为他们自己生产。

当着农民们在地主的或“自己的”土地上工作，农民们自己觉得这是为他们自己，为他们自己的家庭生活而劳动的时候，列宁曾经说：这些农民都不是为他们自己劳动，而是为了地主的地租，为了高利贷者的利息，为了政府的税收而劳动。只有当着土地已经收归国有，当着国家已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当着地主富农及私人商业已经消灭，当着农民已成为国营农场与集体农场即公共农场上的劳动者时，只有在这时候，农民们才是为他们自己劳动。

列宁说：苏联是工人自己的国家。但这个国家是工人阶级所共有的，而不是任何个人所私有的。当着俄国的工人们在十月革命后，为自己的国家在公共的工厂中自动努力工作，提高生产，节省材料，而表现出工人们为公共事业而努力生产的劳动热忱时，列宁曾经对着这种情形说，这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因为工人们已经不是为资本家，而是为他们自己而劳动了。他们用了新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新的劳动。

由此看来，在存在着剥削阶级的社会中，表面上属于自己的事物，常常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党的，公共的，为工人阶级与劳动者全体所共有的事物，就恰恰是我们自己的事物，并且是我们自己最重要的事物。公共的与自己的，在这里表现其一致性。所以我们共产党人及一切觉悟的劳动者，应该把属于党的公共的事物，当作自己的事物，应把公家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一样来爱惜它，把党的公共的工作当作自己的工作一样尽心努力负责地去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为公共事业而牺牲奋斗的高尚的精神，才能成为可靠的党的工作者与负责者，才能成为好的党员。

从这里看来，某些同志的本位主义，也是一种根本上错误的观念。犯这种本位主义错误的同志不了解他自己负责的一部

分工作与党的整个工作之矛盾一致的关系。他只认为他那部分工作是他自己的，而不认为别人负责的工作及党的整个工作都是我们自己的。他对自己负责的工作与别人负责的工作根本上用了不同的态度，所以也形成他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不顾整体的错误。这种本位主义的发展，对党的工作是很有害的。犯本位主义错误的同志为了部分的个别的利益而牺牲妨害整个的全体的利益，他违背着部分的利益要服从全体的利益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所以要不得。好的共产党员是不应该有本位主义的。

固然，没有部分，也就没有全体，部分的利益，常常与全体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不主张完全不要部分，而只主张部分服从全体。即是当部分的利益与全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应该牺牲部分的利益，而不应该牺牲全体。所以我们有时为了更大、更长远的全体的利益，而主张牺牲某一部分，这是应该的。

第二、为党的与劳苦大众的公共事业而牺牲，是最值得的。

在某些同志中说到牺牲，就提出了所谓值得与不值得的问题。要怎样牺牲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才是值得？又怎样才是不值得呢？在这个问题上某些同志有不同的观点，这种观点是由于他们不同的非共产主义的人生观而来的。他们具有旧社会的甚至剥削者的享乐的人生观（如所谓“人生行乐耳”，“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等），认为他们没有享到快乐的生活就牺牲，是不值得的。认为一生没有大吃大喝过，没有过过舒适的奢侈的生活，没有嫖过女人，没有出过风头，没有威风凛凛干过一下……而牺牲了，对于人生是不值得的；如果这些事都作过了或各门都经过许多，那末对于人生就是值得的。他们说：干过这些事，那末死了都值得。这是中国目前社会上相当普遍的一种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也多少反映到我们一些落后党员的思想意识中，如是在我们某些党员中就发生享乐的观念，对目前艰苦生活艰苦工作发生厌倦的心理，如是他们就想了要去贪污、腐化、动摇以至堕落而脱离党与革命。他们想了，作一个地主、资本家、富人、剥削者，是很舒服，很值得的。他们没有去经验过，他们想要去经验一下，如是他们就从无产阶级的队伍中跑到剥削者的队伍中去。剥削者的特务机关也就利用我们某些落后分子的这个弱点，从而加以威逼利诱，如是某些人就这样地堕落为反革命了。但是在富人剥削者那里，那种腐败、堕落、黑暗的生活与家庭，那种暗淡的前途，也并不是舒适的，他们的苦闷，无出路，无生气，也是十分严重。他们与我们前进的革命党人根本不能相比。因为他们是属于必然要死亡的阶级，这个阶级已为自己掘下了坟墓，这个阶级中的许多人明知他们的末日是很悲惨的，然而他们又无法不向自己掘好的坟墓中钻进去并活埋自己。世界上最悲惨的事，莫过于此！然而，偏还有人说：他们是“最值得的”。这不奇怪吗？剥削者不劳而食，倚靠别人的劳动而生活，养得象肥猪一样，一点事不作，对世

界人类社会一点好处也没有，还要在世界上作威作福，危害无数千百万劳动的人们，这是世界上最可鄙最可恶的事情。从来一切正义的历史家，就鄙薄那些不劳而食的剥削者，就尊敬那些高尚的劳动的人们。正因是这样，所以剥削者中明白自己的前途与历史进化的人，尤其是剥削者的青年子弟，他们不满意自己家庭那种腐败黑暗的生活，他们为了自己的将来，而丢弃了自己的家庭，跑到劳动者队伍中，同情或者加入前进的革命政党，已有不少了。他们厌倦那种剥削者的猪一样的生活，他们无所留恋地丢弃了那种生活，他们很对！然而，在我们前进的革命政党中之某些落后分子，还有人想要去尝一尝那种生活的滋味，还以为这或许是很值得的。这对我们党员来说，难道不奇怪吗？很明白，这是一种倒退落后的思想。这与共产党员的党籍是完全不能并存的。

那末，作一个人，特别作一个共产党员，要怎样才算值得呢？

我们说：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党员，为了党，为了社会进化与人类解放，为了无数千百万劳动人类的共同长远的利益，而牺牲奋斗到底，直至终身，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值得，最引起人们的敬仰，最为万世子孙所怀念所歌颂的。

这在我们党内已有无数的先烈，他们就是最值得，最为大众所景仰的人。如果是为了剥削者的利益，为了个人或少数人的优裕生活，为了反对社会的进步与人类的解放，而干坏事，或老死乡井田间与高楼大厦之中，那是最不值得最不应该的，那是永远要被大众鄙薄和唾骂的。从来的剥削者及为剥削者少数人的福利而奔走的人，都引起人们的咒骂。我想，一个有进步思想的有为的有出息的人，特别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完全应该明了这一点的。

所以在我们中，那些埋头苦干的党员，那些艰苦工作，不怕困难，不怕危险的党员，那些一心一意为了党与人类解放而坚决斗的党员，那些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党员，是我们的好党员。虽然在某些个人享受上，他们暂时吃一点亏，然而他们是，或者最后是，为我们大家及群众所信任，所尊敬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最值得的。相反，那些不愿埋头苦干，好出风头，怕困难，怕危险，不忠心为党为人类的利益奋斗的人，那些要求享受在前，吃苦在后的人，都不是好党员。虽然他们在某些个人享受上或者暂时讨了一点便宜，然而他们是，或者最后是，为我们大家及群众所不信任所反对的。也就是说，他们最不值得。

还有在最近有个别的党员要求到政府机关去作行政工作。原因就是因为政府机关有几块钱薪水一月，他们想要多几块钱一月，他们就要求调工作，要到行政机关去。同志们！这是什么观点？有人或者反对行政人员有薪水，如果他向政府提议取消或改正行政人员的薪水制度，那是对的，是一个党员应有的态度。然而某些人的反对，不是真正反对行政人员有薪水，他不反对，而是希望他自己也能得到这点薪水，他口头上的反对，只是借口而已。同志们！这也并不是好党员所应有的态度。我们

加入党，艰苦工作，不是为了几块钱，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民族的与社会的解放。所以我们自愿不要钱，即使几百元一月的事也不去作，而要来作这种无薪水的革命工作，比几百元薪水一月更值得的革命工作。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完全明白的问题，那些不明白的人，应立即改正他们的错误思想。

此外，我们有些党员中还常常有如下的现象：即在分配党员工作的时候，他们要求到最安全，最有保障，工作最容易最简单，而且是最富足，生活最好的地方去，而比较不安全，有危险，土地贫瘠，生活艰苦，工作困难，环境复杂的地方去工作，就不愿意去。即使这种工作对党对革命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他们为了痛快与好的生活而不愿去作。如果指派某个同志去，他会向你说，你强迫我去的，我的情绪不高，等等。同志们！这不是好党员所应有的表现。好的党员是不注意这些的，他只问这件工作对党对革命是否重要，他是否能够作。如果对党重要的，他能够作的，他不计较困难与否，环境复杂与否，他也去作的，他愿意担负最艰苦困难危险的工作，他不把困难的事情推给别人去作，自己作最容易最便宜的事情。这也是我们的党员所应注意的。

第三、要作一个终身的好党员。

作一个共产党员是最光荣的。我们每个同志要作一个终身的好党员，不应该作一个半途的党员。共产党员，是我们自己要作的，没有任何人来强迫我们作党员。也不只是我要作一个党员就是一个党员，这还不够，还要共产党接受我作一个党员，承认我的党籍，我才是一个党员。就是说还要其他的党员及党的组织承认我是一个党员，我才能是一个党员，否则，只有我自己的愿意，还不能是党员。

我们共产党员相信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一切都是变动的，没有不变的东西。所以我们的战略策略工作方法等也讲究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来说，有一件事是终身不变的。这一件事就是我们要为党的利益、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亦即是人类最后解放的利益而奋斗到底。就是我们要作一个终身的党员。这对于我们是终身不变的，变不得的，变了，就叫动摇，变节或叛变，那是党员最大的耻辱。有了这一点不变，然后其他一切才可以根据情况的不同而千变万化，不变是变动的标准和尺度。即静止是运动的标准和尺度。我们一切战略策略的变动的标准和尺度，就是要看这种变动是否适合于无产阶级全体的战斗利益。适合于这种利益就应变动，不适合于这种利益就不应变动。所以，是否适合于无产阶级全体的战斗利益，是测量党的及党员个人的一切战略策略与工作方式之变动是否正确的标准和尺度。自然，这种不变，一般来说，也是相对的，仅仅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来说，是绝对的。因为在几百年前或几百年后，世界还没有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已不存在时，人们自然不会有为无产阶级战斗利益而奋斗的事。所以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来说，这也还是变动的。但对于我们党员来

说，这是绝对不能变的。只有我们在主观上终身绝对的忠实于党与阶级的战斗的利益，在客观上，在我们一切思想言论行动的实践中总是适合于党与阶级的战斗的利益，我们才是好党员。

我们既要作终身的党员，我们对党就不要有什么秘密，不要把某些不利于党的思想言论行动对党隐瞒起来，或者明知某些思想、言论、行动对党是不利的，而暗中秘密地去作，以为这样党是不会知道的。其实，我们的党员如果要做一个终身的党员，那末他的思想、言论、行动，他是一个什么人，他有什么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他作过什么不适合党的利益的事，一年二年以至十年二十年直至他死，那里不会被人知道的呢？最后总是会被人知道；被人了解的。结果，是隐瞒不了的。所以，我们党员，不要有对党隐瞒的不光明的事。过去作过的，自己讲出来好了，我们的党是注意将来，较少追究同志的既往过错的。讲出不要紧，不讲就不好。我们党员应该有“生平所作，无事不可对人言”的坦白。

自然，我们并不是要党员逢人便说自己的历史与过去的一切，不向任何人保守自己的秘密，更不是要党员不为党保守秘密，而是要我们党员不要秘密地去作那些违反党的利益的事，不要口是心非，不要作两面派。

既要作一个终身的党员，也就不要怕有什么事被人误会，被人怀疑。因为误会怀疑总是暂时的，真象总是在最后要暴露出来。一年二年被人误会，被人怀疑，十年二十年直至终身，你如果是一个好党员，总是会被人明了的。暂时的误会怀疑，对于个人常常不一定是有损失的。因为误会怀疑一旦被人明了之后，不独能挽救你在误会中的损失，而且增加对于你的新的安慰和鼓励。

最后，我要说到，我们党的前途是光明的伟大的，我们党员的前途也是光明的伟大的。党的胜利，即是我们一切党员的胜利。党员只有在党的胜利中才会有自己的胜利。所以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好的党，一定要使我们的党不断前进。只有我们大多数党员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努力提高与增进自己的品质，努力前进，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党。我们的党整个说来已经很好，但还有缺点，还在某些环节中有错误，还有不中用的渣滓，还要继续改进，继续提高，继续布尔什维克化。这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的民主共和国的决定因素。在中国没有一个好的大的共产党，没有共产党中央的正确的领导与全体党员的正确的努力，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要建设新的民主共和国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个同志一定要作一个好的党员！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好的党！我们一定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建设一个新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最后实现共产主义！

这就是我在党的十九周年纪念日所要讲的话。就此来回答《抗敌报》、《前锋报》、《迈进报》的征文要求。

（注）这里说的《抗敌报》指《抗敌报》江北版，是当时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机关报；《前锋报》是新四军五支队的机关报；《迈进报》是新四军某单位的报纸。 （此文原载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抗敌报》）

答 宋 亮 同 志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三日

刘 少 奇

编者按：宋亮同志即孙治方同志，当时在苏北华中局党校工作。他认为，党内在陈独秀时期有轻视理论教育的倾向，并写信问刘少奇同志，这个看法对不对。少奇同志肯定了他的意见。这封同他谈理论学习问题的回信，后来刊登在华中局《真理》第二期上。回信指出，党内存在的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一种是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的重要性，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种是过分强调理论，轻视实践的重要性，轻视实践对理论的基源性与优越性。他们都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正确解决与正确联系。”信中分析了中国党理论准备不够的原因，并指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需要理解和把握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信中说：“实际的有生命的马列主义，……包含在一切人们的社会的具体实践中，而在书本的公式上及一切抽象的神秘的地方。”这些论断，同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是完全一致的。

宋亮同志：

来信收到。你的意见是对的。

中国党内在最初的一个时期——陈独秀时代及其以后——有些党员是有一种意见，反对党员对理论作比较深入的专门的研究。甚至在学校中，当许多党员专门学习理论的时候，亦强调反对“学院式”的研究，指那些比较埋头读书的党员为“学院派”；而强调在实际斗争中的锻炼。似乎认为只要有实际斗争的经验，而不要高深的理论研究，就能满足，就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似乎认为马列主义的理论，无须经过相当长期的埋头深刻的研究，就能把握得到的。这种意见，与当时某些党员的另一种意见，即轻视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研究，真正的

学院式研究对抗着。这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一种是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的重要性，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种是过分强调理论，轻视实践的重要性，轻视实践对理论的基本性与优越性。他们都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正确解决与正确联系。

党员在党的学校中学习，从事理论研究的时候，主要的任务是理论上的深造与把握；而不是学校生活的锻炼（虽然这种锻炼联系到所学的理论，即从理论研究中来逐渐改造我们党员的思想意识，亦是很重要的）。这时候，学生应当埋头读书，埋头从事理论的研究。这不仅不能因此就叫他作学院派，而且是学生的主要工作。党员埋头读书研究，这一事实，并不表现为学院派，而是每一个党员在从事马列主义研究时所必需如此作的。任何比较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都必须经过这样埋头读书与研究的阶段。马克思列宁本人，更是如此。过去有人指埋头读书为学院派，是完全错误的。特别在学校中来强调，就更为有害。

学院派是欧洲学术界及马克思主义者中一个派别，是一个专门名词。这派人只有离开实践的理论的研究，轻视实践，而不将理论与实践联系，结果，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成死板的教条，而不能成为实践的指导。这当然是错误的，应该反对的。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及我们党员中，今天仍然是有这种人的。比如有些党员，他们对于切近的组织问题、实际问题等，常常采取一种非常不严肃的态度，不去注意与研究，而轻视它们，认为在这些问题中是不包含马列主义原理的，他们也不会从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去学习到一点什么东西。因此，他们并不以研究《资本论》的严肃态度来研究与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不知道（或忘记了）马列主义学说要成为解决这些问题（行动）的指南。实际的有生命的马列主义，恰恰就包含在这些问题中，包含在一切人们的社会的具体实践中，而在书本的公式上及一切抽象的神秘的地方。

在中国党内上述两种意见的对抗，当时是前一种获得胜利的，在党内相当造成了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风气；结果，阻止了党内理论水平的提高。这是必须纠正与反对的，这与我党直至今天在理论上的准备与修养仍然一般不够的现象，是有密切关系的。它给了党内以极坏的影响。在当时党内关于理论与实践同时并重的正确的意见，是没有得到发展的。

中国党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并不比苏联的布尔塞维克坏，所以中国党历来的组织工作就是很好的，不论作什么事如组织工人，组织农民，组织政府，组织军队，进行各种方式的战斗，只要在党内一动员，为党员所了解，历来就能作得很好，就能完成任务，就能组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工人农民和军队到革命的战场上去。中国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中国党的英勇牺牲精神亦是很好的。数十万党员被人割去头颅的白色恐怖，亦不能威胁我们的党员放弃自己马列主义的旗帜。这些表现，是除联共党外，为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党所不及的。然而，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直至现在，缺乏

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虽然党内少数同志特别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因此，现在提倡党内理论的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中国党只要克服了这个弱点，就能有把握的引导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

中国党的理论准备不够，与上述错误的意见有关系，而成为原因之一。但这也不是唯一的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这些原因就是：

（一）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不久（在五四运动时才有很多的输入）。不象欧洲各国，马克思主义的传布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又由于中国当时是客观革命形势很成熟的国家，要求中国革命者立即从事，而且以全部力量去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无暇来长期从事理论研究与斗争经验的总结（这种情形直到今天还是有的，如我们今天到处都感觉到实际工作中的干部缺乏，一切干部几乎都很难从工作中抽出作一种比较长期的理论学习等）。所以中国党一开始成立，就卷入伟大的实际革命斗争中，各方面都应付不暇。这与中国党的理论准备不够亦是有关系的，这亦是原因之一（这在中国党秘密活动的十年中，情形就有不同。这时是有时间给党来从事理论研究的。但中国党也没有抓住这样的时机来克服理论的弱点。这当然亦是一个错误。这也是由于对理论重要性认识不足及对当时革命形势过分估计而来的，虽然在这时候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运动是有伟大成绩的，党亦曾给以某种重视。然而党没有自觉的来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准，并把这当作当时党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使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及从事文化运动的干部，都包含着很多弱点，没有使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及其干部与全党的全部实践密切联系起来，因此，就使当时的作品十分杂乱，不深刻与不实际；因此，亦不能大大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

（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诸领袖，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他们的著作都是欧洲文字发表的。在他们的著作上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又和欧洲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有其更大的特殊性；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就觉得特别困难些。直到现在，马、恩、列、斯的著作，大部分还未译成中国文字，而中国党员能读马列原著的也并不多，即使能读的人也很少去读完。因此，也影响到中国党员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修养。这也是中国党理论准备不够的原因之一。

由于这些原因，特别是我们党的主观努力不够，二十年来，我党虽有极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但缺乏理论的弱点仍旧未能克服。这是我们今天还要以极大的努力来加以克服的。

所谓中国党的理论准备，是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之规律的统一的把握的。这在中国党的大多数同志们不论对那一方面都还有极大的不够，还是中国党一个极大的工作。

这就是我的答复。

刘少奇同志的亲笔信

衍 行

一九六二年，一位曾参加省港大罢工的老人，参观了经修缮后开放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写信给刘少奇同志，谈了自己的意见。刘少奇同志十分重视群众来信，亲自处理，于同年五月十四日，给广州市政府负责同志写了信。刘少奇同志在信里指出：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全国总工会成立时，“会址是临时的，那时越秀南路惠州会馆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办公处。在解除许崇智部队的武装以后，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入许崇智司令部办公，全国总工会才迁入惠州会馆办公。此时，是一九二五年夏秋之交。至一九二六年冬全总迁至汉口友益街办公，但全总广州办事处仍驻惠州会馆，直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国民党叛变时止。当时全总是在惠州会馆二楼办公，一楼是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等办公处。”少奇同志对当年的史实，作了全面回顾。有关部门根据群众来信和刘少

奇同志的意见，进一步完善了全总旧址的复原工作，广大群众瞻仰旧址后反映良好，认为收益不少。

早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四日，刘少奇同志就曾写信给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提到“广州越秀南路惠州会馆这栋房子，是一九二五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的第一个会所。”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广州反革命暴动，这所房子被反革

命占领，戴卓民同志遇难。”“那里的纪念物，如果你们愿意保存的话，望加以注意。”刘少奇同志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不以自己的意见来发号施令，而是采取商量口吻，虚怀若谷。他的爱护革命文物之情，又何等殷切！今天再读这些文件，仍然感到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

一九五九年，广东省、广州市当时的领导人陶铸、朱光等同志，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愿望，迅速修复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辟作纪念馆开放，使这座有革命历史的建筑物重新放射光彩。

刘少奇同志一九六二年
五月十四日的信

